

壹

阿英全集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阿英全集 / 阿英著.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3. 7

ISBN 7-5336-2205-7

I. 阿... II. 阿...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40998 号

责任编辑: 许振轩 鲍康健 张雪芹

装帧设计: 包云鸠 王潇冬 封面设计: 黄彦

出版发行: 安徽教育出版社(合肥市跃进路1号)

网 址: <http://www.ahe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安徽飞腾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合肥远东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1/32 插页: 13

印 张: 253.625

字 数: 5 700 000

版 次: 2003 年 7 月第 1 版 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2 000

定 价: 580.00 元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 话: (0551)2651321

邮 编: 230061

《阿英全集》编辑委员会

顾问

周巍峙

主编

柯 灵

副主编

黄书元 钱小惠

编委

柯 灵 黄书元 姚永森

吴家荣 钱 璎 钱小惠

钱厚祥 钱小云 许振轩

常务编委

姚永森 吴家荣 许振轩

装帧设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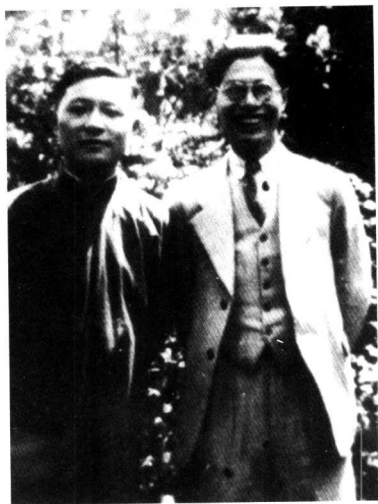
包云鸠 王潇冬

本卷责任编辑

许振轩



三十年代初在上海



一九三八年与于伶合影

彭城先生：洋的力流許多，都怕用着威。補稿
已成，內容有交易。因前稿中多自他處來之
材料，故加註上「洋的」與「補稿」以端。因未及
及補稿，而為始則向篇其家，馬其初補稿時，
補。此書以此可稍定稿。希代其補稿時，
入其稿並加用。然其初補稿，以是書為
希希。補稿時，便立即為一升。以是書為
最清。因謝云是。其書上其西道給也。物

宋氏，而于中又有補稿。希代其補稿時，
以補其書，作其補稿。其書上其西道給也。物

阿英
二二二

一九三五年四月致舒新城信



二十年代及三十年代的部分著述

《阿英全集》出版说明

这部全集收辑了作者生前出版过的著作及未编集和未发表的作品、日记、书信等。编为十二卷：第一、二卷为评论；第三、四卷为诗歌、小说、散文、书信；第五、六卷为杂文；第七、八卷为古典文艺史话；第九、十卷为戏剧、电影；第十一、十二卷为日记。最后编一附卷，收阿英年谱等。

全集的著作，在上述七个部分中，大体按时间编次。

作者生前出版过的著作，一般保留原有的集名，适当地作了一些调整。为了保存历史文献，内容一律不作删改；为了保存语言资料，当时用语，即使现在看来是不规范的，也不加润饰。

这次出版，一般根据作者修订过的最后版本，进行校勘，个别地方在文字上作了订正。疏漏和错误的地方，希望读者予以指正。

阿英全集编辑委员会

二〇〇〇年元月

第一卷说明

本卷收入《麦穗集》、《力的文艺》、《作品论》、《文艺批评集》、《文艺与社会倾向》、《现代中国文学论》六个评论集。

《麦穗集》是一九二八年的作品，当年十一月由上海落叶书店出版，其中“上编”有《介绍一部革命的歌集》（改题《冯宪章的诗》）、《近来的情绪》（改题《从归家篇说起》），“下编”有《〈贫非罪〉》、《〈拆尔卡士〉》、《两篇神话》、《“到民间去”》、《〈白茶〉和〈学生〉》、《〈流血的日曜日〉》、《〈矿坑姑娘〉》、《〈难堪的苦闷〉》、《〈一篇失败了的工人故事〉》（改题《无产阶级者》）、《〈人形之家〉》，共十二篇，后由作者编入《作品论》；“上编”《〈荒土〉后记》，则由作者编入诗集《荒土》。

《力的文艺》是一九二八年的作品，一九二九年三月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

《作品论》是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九年的作品，一九二九年十二月由上海沪滨书店出版。其中第二部分“关于俄罗斯文艺的考察”中第九篇《安德烈夫与〈红笑〉》，后由作者并入《安德烈夫评传》。

《文艺批评集》是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〇年的作品，一九三〇年五月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其中第三部分“中国的新文艺与女性作家”《关于丁玲创作的考察》（改题《丁玲》）、

《关于凌淑华创作的考察》（改题《凌淑华》）、《关于陈衡哲创作的考察》（改题《陈衡哲》）、《关于沅君创作的考察》（改题《冯沅君》）全部经作者增改后编入《现代中国女作家》。

《文艺与社会倾向》是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〇年的作品，一九三〇年十月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其中《革命儿童与农民的新姿态——介绍戴平万的〈都市之夜〉与〈陆阿六〉》（改题《关于〈都市之夜〉及其他》），由作者编入《文艺批评集》。

《现代中国文学论》是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二年的作品，一九三三年六月由上海合众书店出版。

《鲁迅——〈现代中国文学论〉第二章》，一九三〇年二月十日发表于《拓荒者》第一卷第二期，现一并编入。

阿英全集编辑委员会

二〇〇〇年元月

序

柯 灵

中国无产阶级文艺的发生与发展，是和无产阶级革命血肉相连的。它在冰封的大地萌芽，用血泪的浇灌成长。如果我们试图给这种文艺作一个简洁的概括，那么它就是人民的战斗与愿望的结晶。对无产阶级文艺的拓荒者，人民永远怀有感激与崇敬。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距今已七十多年。七十多年的世纪风云，改变了中国，改变了世界，改变了中国在全世界的地位。自七十年代末起，历史赋予我们的任务，是结束长期的动乱，缔造无愧于我们伟大祖国、无愧于社会主义称号的现代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这就需要磐石般的安定团结，水晶般明澈坚强的意志，烈火般的献身精神。七十多年前文艺领域的拓荒者，不少已经离开人世，但给我们留下了筚路蓝缕的动人形象，留下了他们在万方多难中前进的足迹。这正是我们新长征途中可贵的精神财富。

阿英同志是少数披荆斩棘的前驱者之一。我有幸成为他的

忘年交，将近半个世纪之久。在三十年代前期的左翼文学、电影、戏剧运动中，后期的民族解放运动中，我看到过他怎样“在荆棘里潜行，在泥泞中苦战”。他和另一些前辈的行动，就像暗夜中的篝火，照亮了人们的心眼。他在1927年的大风暴中，踏上经过“四·一二”血洗的上海，一直战斗到十里洋场完全沦入日本侵略军的铁蹄之下，才撤退到苏北抗日根据地去。1949年第一次文代大会期间，我在新生的故都和他重逢以后，又是长期的睽违。1962年春，曾有过一度愉快的促膝长谈。那时政治上正好有一小段霁风朗月的日子，他又恰巧经过脑血肿大手术，死里逃生，康复不久，心境轻快，海阔天空地谈了不少。我还记得一个细节：他手边放着一本《人民文学》，其中有新编《李慧娘》剧本，是他太阳社的老战友孟超同志向他求正的，封面题有上下款，当时怎么也不会料到，这是一颗危险的定时炸弹。我为阿英同志的身心康泰深致庆幸，建议他到上海松散一下，因为这是他的旧游之地，到处有他奋战的痕迹，如今换了人间，对他应该别有一番滋味。他很高兴，说他早有这个心愿。有一个时期，我曾殷切地盼望他翩然南下。当时和我约定要来重游上海的，还有孙师毅同志，我同样在巴望着他。但谁也没有想到，大家还会经受一次解放后的白色恐怖。师毅在运动中含冤去世了；阿英同志为“左联”苦斗的一段历史，在林彪、“四人帮”的逻辑里，当然就是罪大恶极的证据。待到1976年夏天，他因避地震，从北京来到上海时，健康已经完全被摧毁，走动说话都很困难，从躺椅上起身，需要人从旁搀扶了。我不想他会是在这种景况下重来上海的。我唯一熟悉的东西，是他那一抹温和的微笑，依稀犹是当年。这笑容使我想到一盆雪白的寒灰，煨着晕红的烬余的炭火，用它最后的生命在向人输温送暖。那是大热天，我忽然打

了个寒颤，从心底冷到全身。我预感到这大概是最后一面了。此后不到一年，我也就得到他与世长辞的噩耗。不久党给他开了追悼会，盖棺论定，肯定了他生前昭昭的功绩。1976年难忘的十月之后，为有功于党和人民的作家艺术家开追悼会，这仿佛是第一次。我在深重的悲痛酸辛中感到安慰，阿英同志到底看到了那帮搅乱世界的魔鬼沉沦地狱。

我的眼前一瞬间又重现出他那温和的笑容。他曾经为之奋斗终生的美好的事业，是不可战胜的。

三十年代的左翼文艺运动，是在今天难以想像的困难条件下进行的。和当时红色革命根据地的战斗比较起来，这可以算是第二战场吧，尽管有真枪实弹与纸上硝烟的不同，却同样要以活鲜鲜的生命相搏击的。——要反映人民的战斗与愿望，作家首先应当是无畏的战士，这在今天也还是真理。

造谣，污蔑，笔尖的围剿，查禁书报，这要算是很客气的了。捣毁摄影场和书店，散发传单和恐吓信，虽然已经为后来十年浩劫中的打砸抢开了先河，也还只是有限的警戒行动。旋风式的逮捕和枪杀左翼作家，就不止发生过一次。1935年初春，是又一次严重的大破坏，大家熟知的田汉、阳翰笙同志，还有其他著名的左翼文化战士先后失踪了；夏衍同志以他革命家的机警干练，戏剧性地躲过了这场灾难。一天早晨，天刚亮，阿英同志忽然出现在我的床前，低声说：“起来吧，我家里昨晚出事了，你快去告诉筱璋，不要回家了。”——原来就在隔晚，梅兰芳先生因为要去苏联演出，宴请几位熟悉苏联文艺的老辈左翼作家求教。散席时已经是深夜，阿英同志回家时，在弄堂口发现家里有了情况，在千钧一发中溜掉了。筱璋同志和他是兄弟行，当时在明星影片公司搞技术工作，因此要

赶快通知筱璋避祸。阿英同志的神情还是那么安详，当他催促我起床时，几乎还带着常有的笑意。早在1929年，阿英同志就坐过西牢，这是再次向他下请帖。这次他虽然侥幸漏了网，他父亲却被当作人质掳走了。我不止一次见过彬彬有礼的钱老先生，他们两代人的感情是非常好的。在革命者的家庭里，这一类的无妄之灾却是平常事。

但任何磨难都没有使阿英同志放下武器。我约略查了查阿英的著作目录，从1928到1941年，他在上海期间著述编订并已出版的作品，就有六十六种之多。如果每种估它十万字，那就在六百万字以上了。——这就是他对反动派响亮的回答。他的作品不断变换署名：钱杏邨、张若英、阮无名、钱谦吾、黄锦涛、张凤吾、魏如晦……但不管他怎么换，也逃不了被查禁的命运。幸而查禁并不能扼杀作品的生命，它们还是在人间流传，有的就这样流传到后世。

抗战初期，当战火从上海西移的时候，大部分文艺战士也随着向武汉、重庆、陕北分路转移，有的冒着炮火上了前线。少数人留守“孤岛”，形成另一支战斗队。

“孤岛”的环境特别险恶。绑架，暗杀，向报馆扔炸弹、送人手，在闹市的电线杆上挂人头。——这是对人类文明肆无忌惮的挑战，却同样没有导致战斗的消歇。

大概是因为队伍减员了，而战斗又非常激烈，阿英同志一肩挑起了几副担子。他笔不停书，几乎“孤岛”所有的抗日报刊上，都有他的文章。他还办起了“风雨书屋”，创刊了大型的《文献》杂志，在漫天烽火中传布与保存党的重要文献。在中国话剧运动史上，有一个历史性的发展阶段——从知识阶层延伸到市民阶层，从游击式的业余演出发展到专业化的长期演

出，这个转折点是从“孤岛”开始的。阿英、于伶和其他话剧工作者，共同作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更重要的是，话剧在当时所起的双重作用：“孤岛”不仅是一座政治上的危城，还是一片精神上的沙漠，话剧舞台就成了密林中的一星灯火，苦渴中的一泓清流。阿英同志先后献出了他的南明史剧《碧血花》和《海国英雄》，在红氍毹上高唱起民族英雄的颂歌。（《碧血花》还改题《葛嫩娘》，搬上了银幕。）演出场所是在浦东同乡会底层改建的璇宫剧院——这个不合租界规定的违章建筑，每天引来如潮的观众，我在池座里多次看到观众情绪的升华。其中有许多衣饰入时的上层妇女是话剧场上的稀客，同样为此激动得热泪盈眶。当剧中英雄就义前亢声高吟“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时候，全场就响起海啸般的掌声，形成一股爱国主义的强大电波，在滚滚的浦江上空激荡回旋，争取了群众，赢得了人心。阿英同志同时还在上海法政学院办起新闻专修科，明显的意图是加强向心力，培养后备力量，准备持久的抗战。因为我当时正在编《文汇报》副刊《世纪风》，他把我拉去教课，讲我自己也不甚了了的“新闻文艺”。班里的同学是和我年龄相差不远的青年，有的还是地下党员，这实际是让我同时去当先生和学生。正是由于这种关系，1979年秋天我在北京的时候，还有头发斑白的同学来访，怀着深厚的感情闲话当年。

阿英同志就是这样的猛士，但他从不把革命当作招牌，挂在脸上或口上。——真正的革命者，吸引人的地方不在于头顶的光轮，而在于灵魂深处穿透表里的亮光。

他是平实谦和的忠厚长者，虽然他在三十年代还不过三十几岁，却已经给人这种印象。他的神情和外表就像是一个淳朴

的店员。他不是一团火，却像冬天的太阳，宜于人们在街头巷尾，随分取暖。

三十年代以前的电影界，是鱼龙混杂、泥沙沉积的所在。而国民党的舆论工具，早已把共产党人涂抹成张牙舞爪、不近人情的危险动物。现在这些共产党人闯进电影圈子里来了，他们面对的，很多是社会知名的大导演、大明星，这些人物见识广，三教九流都打过交道。要对这一流人物施加影响，摆出一副“我来改造你”的架势是行不通的，哪怕是一丁点影影绰绰的苗子；何况那时“赤色分子”本身就没有合法地位。电影小组的三位同志，尽管隐姓埋名，敏感的艺术家的本能，很快就明白了他们是谁，也发见他们是平平常常，很容易接近的人，并确实感到从他们身上得到了助益。我每当在摄影场上看到阿英同志和摄制组上上下下的人们混在一起的时候，就不由得浮起记忆中的一幅构图：那就是农村冬晴的日子，男女老少的农民笼着双手，在墙边的太阳地里负暄闲话。1933年盛夏，我和阿英同志随着《盐潮》摄影队到浙江澈浦盐场拍外景，现在回想，什么都成了过眼云烟，只有一件事还留着鲜明的印象。那时候农村里的苍蝇真是多，在海边或村里开饭，饭箩一端出来，成阵的苍蝇就一拥而集，密密麻麻，使洁白的米饭几乎变黑。这对过惯了城市生活的人，简直是一种恐怖；只有阿英同志，一边挥手驱蝇，一边照样安静地吃饭。许多盐民很快成了他的朋友。三年后他因访书去浙江，还顺道到澈浦访旧。

作风的素朴和生活的素朴，在他身上是和谐的统一，但也有些微妙的矛盾。他吃穿用都很俭约，住的却相当宽敞。因为他人穷而书富，作为藏书家，不但搜求书籍要大量花钱，还得用相当的地面来构筑他的书城，不像一般穷文人，可以在亭子

间里安贫乐道。还有个矛盾，共产党人所处的环境不像现在，一有风吹草动，就得迁地为良，像吉卜赛人一样到处流浪，这也就给他造成极大的累赘。张罗借债还债，在他的日程表里相当频繁，就是这种矛盾连环发展的结果。

作为无产阶级文艺的拓荒者，阿英同志为后人作出了榜样，也留下了垦殖的实绩。

他对文艺活动范围的广泛，是屈指可数的一人。诗、小说、散文、评论、戏剧、电影，十八般武艺他都使用过。这大概和他个性、兴趣的开阔有关。他最初是以勇猛的评论家姿态亮相的，《死去了的阿Q时代》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作品。经过第一次革命高潮，农民运动一度勃兴之后，就得出阿Q时代已经死去的结论，自然是过早了。现在大家近于一致的看法，是直到今天，我们的反封建任务还远没有完成。而且时代的升沉，也不是月旦作品价值的唯一标准，优秀的艺术生命的可珍，正在于它孕育于一定的时代，却能够比它所属的时代生存得远为永久。但是这样的命题，只有经过近三十年——特别是十年“文化大革命”，三年思想大解放之后，才有可能提出来。人们对客观世界的正确认识，常常是以惨烈的牺牲为代价的。无产阶级文艺要在强大的压力下争取生存发展的权利，使政治凌驾于艺术，并处于压倒一切的地位，是很自然的事。对历史进程、阶级变化的估计和实际生活相游离，同样是无产阶级文艺幼年阶段难于避免的烙印，问题是这个印痕打得太深了。我们应当把它们看作重要的思想材料，看到它们所起过的燭火的作用，而完全没有必要以此为贤者讳。

阿英同志后来兴趣渐渐转移，先是矢志于现代文学作品的研究，史料的钩稽索引；接着又惨淡经营，致力于近代文学史

材料的发掘搜罗，整理研究。关于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庚子事变、反美华工禁约等分门别类的《文学集》，以及包罗小说、戏曲、说唱文学、域外文学的《晚清文学丛钞》等皇皇巨帙的问世，给近代文学发展勾勒了一幅清晰的图卷，为研究者提供了浩瀚汪洋的材料，在文艺和学术研究方面，都是极有价值的贡献，八十多年来没有人这么做过。

阿英同志倾注力量较多的另一个领域是散文。他对“五四”以来散文的发展脉络，著名散文作家的文品风格，都作过精到的剖析。他自己的散文随笔，在全部创作中的比重也相当大。这些文学的核心是迫切的现实感，而笔锋所至，纵横开合，娓娓而谈，从历史掌故、社会风习、典籍图书、小说戏曲，直至民间说唱与绘画。其中特别使人感到亲切的，是他革命生涯的直接反映，例如题为《流离》的1927年日记选，以“我们今天第二次逃出了虎口”始，以“我要继续我的漂泊去，东西南北处处在我都是栖息的地方，处处都是我埋骨的处所”终，朴实无华地记录了一段不平常的日子：缇骑的追逐，星夜的逃亡，滂沱的大雨，泥泞的田埂，蹇驴、小舟、荒鸡、村犬，密林中的会议，风暴中心的武汉，逮捕，杀人，挨户的搜查，随时随地的盘问，“人人恐怖，人人自危”，紧急的通知，仓皇的撤退。但在辗转流迁中，依然不忘湖畔的晚霞，窗前的明月，山径的野花，老农村姑口中的神话与民歌，不废读书与写作。这差不多可以作为拓荒者的生活速写来看。

阿英同志去世已经二十多年。他的“埋骨的处所”，不仅在家乡芜湖，也在人民的心坎里。如果逝者有知，他应当含笑于地下了。

本文原载1980年《文汇报增刊》第3期。现征得作者同意，

移作《阿英全集》的序，文字作了个别变动。——《阿英全集》编辑委员会。